

序

中國是史學大國，史學著作浩如煙海，單就歷代「正史」而言，就有「二十四史」乃至今日所謂「二十六史」，總計起來，有二百三十篇和三千七百五十卷。近代史家能遍讀「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另加一本《資治通鑑》，已經很難得了。把「二十四史」由頭到尾讀完，似乎只有呂思勉一人，他甚至反覆讀了三遍，部分還不止此數。據說他用四年時間通讀一遍，如是者前後達十四年之久。

呂思勉一面閱讀正史，一面做札記，有的寫入他的著作，有的作為撰史時的參考。他與陳垣、陳寅恪、錢穆並稱二十世紀中國四大歷史學名家，著作等身，計有兩部通史、四部斷代史、五部專史、八部近代史著作以及文學、文字學、通俗讀物等，總數超過一千萬字。其中一個特色，是將正史材料的精華熔鑄

成為專書，不妨認為，呂思勉的著作大部分是從中國歷代正史提煉而成的。

時移世易，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即使學術資訊如何發達，檢索工具怎樣便捷，中國史研究者要全盤掌握和運用歷代正史材料，以一人之力，幾乎是不可能的。藉着呂思勉的著作吸收傳統史學的精粹，肯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有鑑於此，近幾年來，我把呂思勉的著作加以系統整理，寫成研究述評，目的就是為年輕一代的學子以及對中國歷代正史有興趣的讀者，提供一個入門途徑，俾不至於望洋興歎。本着「博通與創新」的觀點，強調對學問和文獻要求博通，對方法和理論務求能創新，這正是呂思勉史學的精神所在。

中國古時稱史學為「乙部之學」，其位置僅次於經學，在四部之中起着承上啟下的中堅作用，因而有

「經史之學」之稱。自從二十世紀初各級學校廢止讀經以來，經學已漸成經學史，史學的地位更形重要，蔚為國學大宗。年輕一代的國人如果對歷代正史缺乏較透切的認識，中國史學以至文化傳承，實在是足以令人擔憂的。

我在大學時代修習中國通史、秦漢史、隋唐五代史及中國近代史等科目，呂思勉的著作是必讀的；其後任教中學和大學，也常以呂氏之書作為參考。他不但撰寫學術專著，同時也編寫中學課本與普及讀物，供不同程度人士閱讀和進修之用。現時坊間有多種呂著重印，正好說明跨世紀的新時代讀者亦有此需求，呂著歷久而常新，今日讀來仍能令人深所感受。

本書只是為認識呂思勉的大量著作提供一個藍圖，綜合學界人士的見解和研究述評，就呂氏各種書籍作簡明扼要的介紹，使讀者對其生平和學術有全面

目錄

的了解。深入的探究，還在於鑽研呂氏著作，進而以其他學者的同類書籍作延伸閱讀，或者加以參照和比較。如果選取正史中有關的篇卷仔細閱讀，必定獲益良多。

能夠專精一個斷代史本已不易，要博通中國歷史就更加困難，沿着呂思勉構築的「階梯閱讀法」或者「階梯學習法」，按部就班，拾級而上，肯定可以更上一層樓。在傳承中尋找創新之道，弘揚文化，即使「雖不能至，自心嚮往之」。我在大學歷史系任教三十餘年，講授過多個中國史科目，自問學術未深，只求盡力以赴。本書亦復如是，拋磚引玉而已。

周佳榮 謹識

2022年7月28日

序	3
第一章 呂思勉的生平和著述	11
第一節 早年的讀書經驗	12
第二節 平實的教學生涯	15
第三節 豐碩的學術成果	20
第四節 眾多的著作怎樣讀	29
呂著選讀 從我學習歷史的經過說到 現在學習歷史的方法	34
第二章 創新體例的中國通史	47
第一節 中國通史著述的特色	49
第二節 風行一時的《白話本國史》	51
第三節 《呂著中國通史》的經緯	56
呂著選讀 怎樣讀中國歷史	61
第三章 中國民族史和文化思想	75
第一節 中國民族三派說	77
第二節 中國社會制度沿革	80
第三節 中國文化與政治思想	84
呂著選讀 本國史緒論	89

第四章 先秦史與學術思想	102	第八章 史學概論和典籍讀法	196
第一節 《先秦史》的內容重點	104	第一節 歷史研究法和史籍讀法	197
第二節 對先秦學術有獨到見解	106	第二節 評介《史通》和《文史通義》	203
第三節 關於《古史辨》的說明	109	第三節 《呂思勉讀史札記》珍貴可藏	206
呂著選讀 研究先秦諸子之法	113	呂著選讀 整理舊籍之方法	210
第五章 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史	119	第九章 談文論史與為學之道	226
第一節 獨創體例的《秦漢史》	122	第一節 國學概論和經子解題	228
第二節 通俗易讀的《三國史話》	124	第二節 為學方法與治史門徑	230
第三節 條理分明的《兩晉南北朝史》	127	第三節 呂思勉研究專著導讀	231
呂著選讀 讀舊史入手的方法	131	呂著選讀 論讀經之法	235
第六章 隋唐五代史和宋明文化	143	附錄一 呂思勉年譜簡編	248
第一節 晚年完成的《隋唐五代史》	145	附錄二 呂思勉著作初版繫年	255
第二節 宋代文學史概說	149	附錄三 呂思勉著作重印及整理進展	257
第三節 對宋明理學的看法	151	主要參考書目	260
呂著選讀 治古史之特殊方法	155		
第七章 中國近代史及專題研究	173		
第一節 中國近代史講義三種	174		
第二節 早着先鞭的《日俄戰爭》	181		
第三節 民初撰寫的《國恥小史》	184		
呂著選讀 本國史結論	188		

表解目錄

表 1 「呂思勉文集」各卷編目	22
表 2 「呂思勉全集」各冊編目	25
表 3 呂氏著作階梯閱讀法提示	48
表 4 抗戰時期出版的中國通史著作	49
表 5 呂氏中國通史階梯閱讀法提示	55
表 6 呂氏中國通史三種的比較	59
表 7 呂著中國民族史和文化思想	76
表 8 中國古代史階梯閱讀法提示	103
表 9 先秦時期年代一覽表	103
表 10 秦至南北朝時期年代一覽表	119
表 11 隋至清朝年代一覽表	144
表 12 呂氏中國近代史著作編次	174
表 13 中國近代史階段閱讀法提示	175
表 14 呂氏歷史學研究階段閱讀法提示	197
表 15 呂氏讀史札記出版概況	207
表 16 呂氏學史門徑與為學方法	227

第一章

呂思勉的生平和著述

呂思勉是近代中國一位以讀書勤奮和著述繁富見稱的歷史學家，知識廣博而又實事求是。他的著作在兩岸四地廣泛流傳，為學界所推重，說明了他的學術成果經得起時間考驗，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以專門史、專題研究取得成績固然不易，在通史、斷代史方面要作出貢獻尤難，呂思勉的著作多達一千四百餘萬字，涵蓋了中國歷史文化的主要內容，並且層次井然，為後學提供閱讀和研習門徑，其學術遺產猶如一個豐富的文獻資料庫藏，有待繼續開發的空間甚大。^[1]

呂思勉的學術表現，史學名家譚其驤曾予以高度評價，他說：「近世承學之士，或腹笥雖富而著書不多，或著書雖多而僅纂輯成編，能如先生之於書無所不讀，雖以史學名家而兼通經、子、集三部，述作略數百萬言，淹博而多創獲者，吾未聞有第二

人。」^[2] 最關鍵的一句就是「淹博而多創獲」，呂思勉當之無愧；謂為一代國學名家，也是名副其實的。

要了解呂思勉的史學，應先從他早年勤奮的讀書經驗入手，因為他對中國典籍和歷史文化的認識，自少年時代就已奠定基礎了。進而考察他的教學生涯，由小學、中學到大學，都能做到一絲不苟，數十年如一日，平實中見真心和熱誠，他用來備課的講義，大多改編增訂而成各種著作，達到教研合一的境界。接着，就是瀏覽呂氏豐碩多元的學術成果，從而選用、閱讀自己需要及有興趣的書籍；至於為數甚眾的著作怎樣讀法，在這裏也提供了一些意見供大家參考。

第一節 早年的讀書經驗

呂思勉，1884年（光緒十年）生於江蘇常州十子街的呂氏祖居。六歲至九歲，跟從薛念辛讀書；十歲時，其師服官揚州，改從魏少泉讀書至十二歲。呂思勉〈自述〉說：「予生於中法戰爭之時，至甲午中日戰爭，年十歲，家世讀書仕宦，至予已數百年矣。」^[3]

呂思勉幼承庭訓，1893年（光緒十九年）九歲

時，母親程氏授以《綱鑑正史約編》，開始接觸史學。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夏，魏師赴新疆；呂家因環境拮据，未能延師，呂思勉遂由他父親自行教授學業，前後凡三年。當時呂思勉已有閱讀報刊的習慣，對《時務報》甚為喜好。

《時務報》是維新人士在上海創辦的旬刊，由梁啟超任總撰述，所載論說大率以變法圖強為宗旨，並有論摺、時事報道、域外報譯等。《時務報》創於1896年8月，至1898年停辦。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光緒帝下詔維新，史稱「戊戌變法」，但僅百餘日，慈禧太后即發動政變，維新失敗，康有為、梁啟超出逃。當時呂思勉在政見上是贊成康梁的，翌年入陽湖縣學，名義上為舊式的縣學生，「然舊式學校，從無入學讀書之事，實係科舉之初階而已。」^[4]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事件爆發，八國聯軍攻入北京，舉國震動。這時呂思勉在政見方面，對清廷已深表絕望。本年，自讀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及其續編和清朝陳鶴《明紀》。此後幾年，有三件較重要的事可記：其一，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受教於丁桂徵；其二，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赴金陵應鄉試；其三，1904年（光緒三十年），與虞菱女士結婚。婚後擔任小學、中學教

職，繼而擔任師範學校教員。

呂思勉的家鄉常州，歷來是人文薈萃、名家輩出之地，至清代風氣尤盛，出現了常州畫派、今文經學派、陽湖古文派、常州詞派、常州詩派、孟河醫派等文化群體，近代詩人、思想家龔自珍曾以「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的名句加以推崇。清代詩人、史學家趙翼，更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來形容常州名家風起雲湧，在文化創新方面有卓越的表現。^[5]

趙翼（1727—1814年），長於歷史考據，他的《廿二史劄記》，與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並稱清代三大考史名著。趙翼治史並不限於只對舊史補缺訂偽，而是把分散的史料加以比類綜合，同時也留心於評述歷代治亂的因由，以及古今社會的變化。《廿二史劄記》所述實為「二十四史」，即從《史記》到《明史》，因當時尚未將《舊唐書》和《舊五代史》定為「正史」，故以「廿二史」為書名。全書用筆記體裁寫成，共三十六卷，附補遺一卷，按二十四史先後分卷編次；每卷以類相從，各立標題，共為六百零九條，1795年（乾隆六十年）成書。^[6]《廿二史劄記》是研究「正史」的重要參考書籍，呂思勉受其影響頗大。

至於呂思勉出生和成長的那個時代，中國受盡

西方列強的欺壓。中英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簽訂了近代中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自此國門大開，內憂外患接踵而來。洋務運動推行西化，卻有中法越南之戰和中日甲午之戰的敗局；變法運動為時短暫，旋即為戊戌政變摧毀；八國聯軍大舉入京，清朝國運陷於前所未有之低落；日俄戰爭爆發，戰場在中國境內，俄國戰敗，損失卻多由中國及國人承受。在這樣的情況下，國人生活相當困難，對於讀書人來說，精神上的困擾更令他們感到傷痛。晚清時期的呂思勉，家事和國事的壓力都相當繁重。在他後來的憶述中，個人與社會經常是連在一起的；他的近代史著作如《日俄戰爭》、《國恥小史》等，不少都有切身體驗。

第二節 平實的教學生涯

呂思勉從二十一歲起從事教學工作，至四十歲為止，由小學、中學至師範學校教師，其間有幾年曾先後在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任編輯。1925年（民國十四年）四十一歲時赴上海滬江大學任教，第二年任上海光華大學國文系教授，後來擔任歷史系教授、系主任，直至1951年院系調整，光華大學併入華東

師範大學，呂思勉任該校一級教授，總計於各級學校的教學崗位上長達五十年。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呂思勉在私立溪山兩級小學任教至次年年底；當時他父親患病，臥床將近一年而逝。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由年初至暑假前，呂思勉在蘇州東吳大學教國文、歷史，〈自述〉說：「因氣味不投，至暑假辭職去。」^[7]同年冬，在常州府中學堂任教歷史、地理，至1909年（宣統元年）；呂思勉專心致意研治史學，是從這時開始。

常州府中學堂是留學日本回國的屠寬（字元博）所創，屠寬的父親是著名蒙元史家屠寄，著《蒙兀兒史記》，還編過《中國地理教科書》。呂思勉在校中教過的學生錢穆，後來成為著名歷史學家。^[8]

1911年（宣統三年）武昌首義，辛亥革命爆發；次年中華民國成立，清帝遜位，中國二千多年來的帝制，自此結束。上海是當時出版事業集中的城市，中華書局於1912年（民國元年）成立，是繼商務印書館之後的主要出版社之一。1914年（民國三年）暑假後，呂思勉入中華書局任編輯，這年作《本論》十二篇，是他從事著述之始；翌年開始編著《國恥小史》上、下冊，是他出版的第一本書。

1918年（民國七年）秋，呂思勉辭中華書局之職，擬前往瀋陽高等師範學校任教，但未成行。第二

年上半年，任商務印書館編輯，協助謝觀編著《中國醫學大辭典》，並且對醫學產生興趣，撰寫了《醫籍知津》，後來改題《中國醫學源流論》。^[9]

1919年（民國八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五四事件，擴大而為全國性的五四運動，影響深遠。這年暑假後，呂思勉赴蘇州省立第一師範任教；次年1月，到瀋陽高等師範學校（東北大學前身）任教，着手編寫《中國歷史講義》、《國文史地部國文講義》等，並在《瀋陽高師週刊》發表〈新舊文學之研究〉等文章，積極參與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始自1915年（民國四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題《新青年》，在北京繼續出版，成為文學革命的推動者。新文化運動在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支持下，後來且與五四運動合流，匯為五四新文化運動。1923年（民國十二年），呂思勉在江蘇省立第一師範專修科任教；1925年（民國十四年），任私立上海滬江大學教授。該校原稱上海浸會大學，是教會所辦。

1926年（民國十五年）起，呂思勉任私立光華大學國文系教授、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該校在早一年成立，緣起於「五卅慘案」發生後，聖約翰大學師生因不滿學校當局阻撓師生的愛國行動，紛紛離校，籌議在上海自辦大學，學生家長王省三、張壽鏞等捐

地捐款，公推張壽鏞為校長。其初租賃霞飛路（今淮海中路）534號為校舍，次年遷入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新址，除收容聖約翰大學的離校學生之外，並兼收各地的轉學生。

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後，呂思勉一度在省立安徽大學任教；此外，他一直在光華大學擔任教職。1935年12月，與馬相伯等署名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1936年8月，任吳越歷史研究會理事。1941年上海淪陷，光華大學停辦，呂思勉攜眷歸鄉，閉門著作。1942年（民國三十一年）秋，任常州青雲中學文史教員，曾兼輔華中學教席。抗日戰爭勝利後，重返光華大學任教。

抗戰期間，光華大學數度遷移，在四川成都設立分部。1941年（民國三十年），日軍進佔上海租界，校方為避免向日偽登記，本部被迫停辦，部分教職員創辦誠正文學社和格致理商學社。抗戰勝利後，光華大學在上海歐陽路復校，朱經農、廖世承為正、副校長，成都部分則改為華成大學。^[10]

光華大學設有文、理、商三個學院，另有中學部，蔣維喬、呂思勉與該校淵源甚深，潘光旦、章乃器、羅隆基、胡適、王造時等人，都曾在校內授課。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總計有十四個學系。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2年進行院系調整

時，撤銷光華大學，大部分併入華東師範大學，其餘併入同濟大學。呂思勉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一級教授，並當選上海歷史學會理事、江蘇省政協委員。晚年專心致志，從事斷代歷史研究和撰述。1957年10月9日病逝，終年七十三歲。

呂思勉的教學生涯中，與光華大學淵源甚深。〈自述〉說，光華大學初創時，「氣象甚佳，確有反對帝國主義之意味。國文系主任童伯章君，本係常州府中學同事，再三相招。1926年暑假後，予遂入光華。此時光華無歷史系，予雖在國文系，所教實以歷史課程為多。後歷史系設立，校中遂延予為主任」。1932年，日人犯上海，光華延遲數月未能開學，其時欠薪甚多，呂氏難以支持；適安徽大學開辦，邀他前往任教，明言決不欠薪，呂思勉於是向光華辭職，光華相留，改為請假。呂氏赴安徽三個月，欠薪亦與光華無異。因女兒將到上海讀書，於是復返光華大學。其後在華東師範大學任教，亦是光華改組後的延續。^[11]

二十一世紀初，華東師範大學創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所，又成立呂思勉研究中心，舉辦了一些紀念活動和出版研究專著。江蘇省常州市天寧區十子街東側8—10號，是呂思勉幼年讀書和生活的地方，為呂氏祖居，現在作為呂思勉故居供遊客參觀。